

炮楼里的女人

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

张双兵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炮楼里的女人

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

张双兵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张双兵
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214-07058-6

I. ①炮… II. ①张… III. ①军国主义—性犯罪—史料—日本 ②日本—侵华—史料—山西省 IV.
①K313.460.6②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1832号

书 名 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
著 者 张双兵
责任编辑 戴宁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25 插页2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058-6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赵润生

张双兵，一位毅然挑起揭开历史封尘真相责任的山里汉子。他是山村小学的一位教师。他曾有当好一名优秀教师的远大理想，他曾有当一名文学家的梦想，他曾为此在孟县西部地区创办了乌河文学社。但是，历史赋予了他更崇高的使命，从一个战争受害者到一批战争受害者对他苦难的诉说，让他写出了这本书。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机会，在一个秋天收获的季节里，一位爬在谷地里捡谷穗的老妇人的身世让他感动。这位老妇人就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军性暴力的战争受害者侯冬娥。是张双兵用十年的时间让老人说出了真相。张双兵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大陆当年日军性暴力的幸存者还活着，要向日军讨还血债！为了查明真相，他联合国内外友人对中国战争受害者进行了艰难的调查取证，他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走地大川寻找受害人。为了寻找这些老人他甚至除夕夜还在大山中奔走；为了寻找这些老人他在风雨交加的河道中赶路，险些被洪水冲走。他寻访了数千人次进行调查，寻找到近百位当事人，写了数十万字的调查证言，为起诉日本政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些对战争受害亲历者的第一手调查文字，都已如实载入本书，其历史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在张双兵的感召下，中日人士纷纷加入寻找帮助受害者的行列。一位叫李贵明的农民加入进来，对受害老人的生活给予极大的帮助；我作为一位文史工作者也帮助张双兵整理了大量的证言史料；北京女律师康健为申张正义，主动为老人们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奔波于北京、山西和日本之间；一群日本正义人士：大森典子、石田米子等为帮老人们讨要赔偿，从物质、精神等各个层面给予最大的支持。

是张双兵以他的极大勇气，让老人们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他承受着巨大压力，带领老人们第一次走上日本法庭，走向日本民间的证言集会，向日本社会公布事实真相。当日本法庭内外的反对者向他示威的时候，他勇敢地站

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用血的历史事实给予迎头痛击。他把法庭内外的亲身感受和诉讼内幕在本书中一一告之读者。

在张双兵和他的这些中日朋友们的不懈努力下,在十多年的艰难诉讼中,他们将这场跨世纪的讨回正义的官司,从日本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日本的最高法院,使日本法院从最初不承认基本事实到承认受害事实,取得了初步胜利。他用一支笔真实记录了每一次在日本法庭的斗争经过。

张双兵的事迹让人们感动。他和他朋友们用力量揭开了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用奉献担当起了一份沉沉的历史责任。他为正义而呼,他为公正而争,他为和平而歌,他为苦难而爱,他为揭开历史封尘真相而书,他为抚平战争创伤而不懈努力,他为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位将历史真相告诉给人们的英雄!

前 言

“慰安妇”一词起源于日语，日本的大辞典《广辞苑》里对于“慰安妇”一词的注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期间，把许多中国女性强行抓到日军据点，或是当成任务派到村子里，让伪政权寻找年轻女人，送到日军据点周围的慰安所里，日夜遭受日本官兵的糟蹋。她们是没有自由、没有生命保障、饱受饥饿和寒冷、任凭日本人欺凌的可怜者。比起《广辞苑》中“慰安妇”一词的解释，她们的遭遇要悲惨得多。所以更多学者将“慰安妇”一词定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根据我二十几年来仅对山西省的盂县、阳曲县、沁县、武乡县和原来在山西居住，后来因为搬迁、结婚等原因而辗转到河北等外地的女人调查得到和掌握的数据研究发现，每一个日军据点平时至少有五六个女人，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个女人。例如：在盂县的进圭据点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六七个女人（据侯冬娥、张二妮讲）。在阳曲县南温川据点也是一样。北京档案二馆现存的资料中，日军战犯冈义一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交代材料中说，1943年，他在阳曲县南温川据点任分队长时，从北温川村、岔口村一次就抓了刘乃妮等10名女人。受害者刘乃妮也回忆诉说了当年的这一事实。据调查，在那个时候被日本兵抓去的女人，少的关押十来天，多的关押一到两个月，特殊情况也有一两年，就以每一个据点每次抓捕5—6个女人，每20天换一批女人计算，那么一年内在一个据点被抓的女人预计有100多个，按1个县10个据点计算，得到的数据至少是1000。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期间日军占据过我国至少1000个县的区域（仅山西省就被侵占过80多个县），这样计算仅一年在中国就有100多万的无辜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日军侵占东北14年，全面侵华8年，照此计算，强掳慰安妇当以数百万计。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上百万妇女被日军当作性工具，对于这些中国妇女来说，她们不是日语本义上的“慰安妇”，她们对日本兵恨得咬牙切齿，恨不

得吃他们的肉、抽他们的筋、剥他们的皮，怎么会慰问和安抚他们？日本兵不把她们当人待，她们也把日本兵看成是畜生。

战争期间，日军除了从本国带来了慰安妇外，还在朝鲜、中国抓捕大量妇女充做性奴隶，证据确凿，世人共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日本政府都不能逃避历史，推诿责任。但是，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政府竟然不能公开承认犯罪事实，不能诚恳认错，向受害者谢罪，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伤害受害者感情的事情，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辩护，掩盖侵略事实，美化侵略行为。

尤其是这些被日本兵糟蹋过的女性，她们当年承受日本军人的残酷迫害，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去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只能知道她们是慰安妇、性奴隶而已，有谁会知道她们在战争中有过死里逃生的劫难。而且在此之后，她们的身体和心理上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她们有的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一辈子没有经济收入，依靠别人的怜惜和施舍度日；也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到了老年，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得了大一点的病，就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只能等死。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战争年代和战后的几十年里陆续逝去，只有一少部分活到现在。这一少部分中的几位受害者冲破几千年封建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层层枷锁，不顾儿女和亲戚友人们的极力反对，顶住精神和舆论上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指控日军的暴行。只有她们自己知道，恢复名誉对她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我的调查过程中，受害者因年事已高，对具体时间、地点、人名可能记忆有误，但对当时的受害经过都记得非常清楚。她们要为自己洗刷耻辱，争回属于自己的尊严，讨回公道。但是日本政府连这一起码的慰藉都不能给予她们。

面对日本政府的残酷无情，我作为山沟里的一介百姓，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帮助她们，只能将此调查报告公诸于世，以唤起人们对这一惨痛史实的关注，对日本政府所持态度的愤慨。

目 录

前 言	1
孟县调查实录	
进圭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3
侯冬娥 (3) 冯壮香 (16) 刘面换 (32) 李秀梅 (39) 陈林桃 (43) 周喜香 (45) 万爱花 (47) 张二妮 (49) 胡壮娥 (56) 刘银爱 (57) 刘二荷 (57) 柴玉花 (63) 侯巧良 (64) 张小妮 (73) 侯金良 (78) 郭喜翠 (82) 周润香、侯二毛、赵变梅、侯玉桃、陈喜云 (88) 张改香 (90) 周变香 (92) 武春林 (93) 陈计连 (94) 邢三妮 (95) 曹黑毛 (100) 韩银梅 (103)	
河东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105
南二朴 (105) 张先兔 (107) 赵润梅 (109) 刘海莲、刘 计花 (110) 尹林香、尹玉林 (110) 王改荷 (111) 高银 娥 (112) 杨时珍 (113) 尚春燕 (114) 韩桃桃 (114) 张五昭 (115) 李壮林、王贵青 (116)	
西烟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117
杨壮来 (117) 赵存妮 (117)	
上社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119
王变良 (119) 李金连、张玉壮 (120)	
阳曲县调查实录	
南温川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123
赵乃花、侯计秀、李存香 (123) 王壮秀 (124) 刘乃妮等人 (125) 姚乃妮 (131) 贾石头、杨改香、黄土芳 (133)	

沁县调查实录

交口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137

王娥孩 (137) 李金鱼 (138) 刘海云 (139)
李金娥 (140) 李富兰 (141) 郭毛孩 (143)
刘风孩 (144) 郭风英 (145)

武乡县调查实录

南沟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149

白秀英 (149) 冯女儿 (151) 郝改英 (154)
郭云香 (155) 范莲花 (157) 赵兰英 (157)
李改兰 (159) 任兰娥 (160) 袁改连 (161)
郝菊香 (163) 赵志兰 (164) 秦爱珍 (166)
郝月连 (167) 杨爱花 (169)

孟县调查实录

进圭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41年9月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进圭村,修建了据点。进圭村有200多户人家,800多人,祖祖辈辈以来居住在乌河流域拐弯处的北面坡地上。自从被日本侵略军占据之后,日本兵把一个村子从中间分成东西两部分,把东边的老百姓通通赶出村子,辟为战略驻地。建立了日军作战指挥部、电台通讯部、伪军队部、医疗保健部、澡堂、厨房、军马饲养处、兵器库、操场、关押抗日干部和共产党人的牢房、刑讯拷打的房间,以及关押被抓妇女的地方,也就是被日本兵称为“慰安所”的地方。还有更多的是日本军队中队长、小队长和大批士兵的住房。此外,在村子的西边是为日本兵服务的维持会和与维持会有关联的一应设施,还有商会店铺、饭店、小百货店。进圭村的老百姓被挤得没有地方住,想到周围村子的亲戚家去住,又很不安全。因为进圭村是治安村,不怕日本军队的扫荡屠杀和抢劫。也正因为这一点,在进圭村有亲戚的老百姓也愿意到进圭村来暂时居住,以保平安。所以当时进圭村的人口非常多,流动也比较大。不过流动居民要到进圭村居留,需要到日本军队队部和维持会那里办理手续,领取良民证件等,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军占据孟县、阳曲县、沁县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抓“花姑娘”,强奸女人。但是与在上海和武汉等大城市的调查情况不同,不管是在村子里到处强奸女人,还是把“花姑娘”抓住强行拉到所谓的“慰安所”里为日本兵做慰安妇,这些日本兵都不用或者很少用“套子”之类的东西。因为日本士兵知道这里的女人都是“良家妇女”,受封建思想的束缚,除自家的丈夫之外,再没有别的男人。未出阁的闺女更是不用怀疑。日本人知道,即使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也不会得性病之类的传染病,他们对这里的女人太放心了。

侯冬娥

(调查时间:1982年秋至1994年7月)

1982年2月,我因为工作需要,调到高庄村学校任教。10月,一次偶然的机

会我认识了侯冬娥，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苦命的老太太，听说她曾两次被日军抓到据点做慰安妇。她在高庄村找过三个男人做丈夫，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开始她和第一任丈夫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结果就因为知道她被日军逼迫做过慰安妇后，第一任丈夫觉得她“不干净”，战后就领回了一个小老婆，把她抛弃了。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之下，只好又找了村子里的一个光棍。但是第二任丈夫身体不好，不能经常下地劳动，生活也不算太好。尽管如此她别无所求，只盼望着她丈夫的身体好起来。因为日本人把她糟蹋得不能再为丈夫生儿育女，她还收养了一个儿子，希望能陪伴她一辈子。可是命运偏偏捉弄她，只过了十几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就去世了，她又过起了单身女人的生活。她非常伤心，本不打算再次嫁人，在农村，一个家庭没有男人撑着，是要经常被邻里欺负和看不起的。侯冬娥只能再次嫁人。

在我间接地知道了侯冬娥的苦难之后，就决心一定要走进她家，直接采访她。

进门第一印象，她家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矮小的街门，院子的北面是三眼石窑洞，从家门走进去，两边是分开的堂屋，右首一眼是侯冬娥丈夫的哥哥李三小的住处，屋子里没有一件摆设的物品；左首一眼是侯冬娥和她丈夫李五白的住处。炕上铺着很破很破的一张席片，炕头有很小的两卷铺盖，地上只有一个木头墩子当作小凳子，还有一个木头红柜子，这也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那一年侯冬娥 61 岁，由于身体的原因她显得比较老，但从秀气的脸廓，可以看出她曾经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丈夫李五白，70 岁，大个子。原本应有一米八的身高，但他已严重驼背，头上没有长几根头发，鼻子在战争年代染上梅毒烂掉后形成了一个黑深深的洞，要是不知道的人看见他这副怪样子，真要吓一跳。李五白的哥哥李三小，73 岁，也是一个大个子，退伍军人，早已失去劳动能力。这就是她的一家人，3 个人加起来超过 200 岁。

我想问她在战争年代里受害的事情，从家庭生活到邻里亲戚绕着弯子，到了最后，好不容易才绕到正题上。她认真地听完我的来意后，苦笑了一下，对我说：没有用，说出来让人笑话。她把话题也绕到另一方面，拉起了家常。

一周后，我又一次来到侯冬娥家，同她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又绕到战争年代的话题上，她非常警觉地又把话题扯回到邻里纠纷的问题上面。眼看半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快到了中午，她看我非常焦急的样子，苦笑了一下对我说：你的心里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说，不过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不会在背地里说我的

坏话。她那样说，意思是告诉我，她有许多话不便说，从这几句话里边，我知道了她不敢随便说出来的原因。我的心里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同时也感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告诉人的事情，我原来想得太简单了。

从此以后，我时常到她家里拉家常，说一些老年人的苦闷。有的时候，谈一些与她无关的战争年代的事情。说其他人的事情，只要不提起她，她会有声有色地全部告诉我。从这一点看来，她的记忆力很好。对几十年前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这样，我一有时间就到她家去闲聊。她对我有了好感。说实在的，我和她交往，不是想探知她的隐私。她不告诉我自有她的道理，我也不便再继续问。那时候我看到她非常的可怜，也尽力而为地为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就这样，一直过了整整十年，1992年6月，我看到关于战争赔偿的有关报道，立刻想到战争受害人侯冬娥，她终于有了诉苦申冤的好机会。我去她家向她报告了这一消息，她却不相信。又过了二十几天，我拿着北京来信，又一次来到侯冬娥的家，向她说明要为她申冤雪恨，洗刷背负了几十年的耻辱。她听了，依旧不相信。她说：我十分相信你，就是不敢相信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在20年前，中国和日本和好了。我们这些受尽苦难的人，当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还发表联合公报的时候，心里边实在是难过极了。中日未建交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提起过可以为我报仇雪恨，现在两个国家又好了，倒有人提起这件事了。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人再关心我们这些受过苦难的老百姓了。

我再三地向她解释，这是真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邦交正常化是前提，好关系也要算清账。正是有了外交关系，也才能有机会为她进行索赔。不管我如何向她解释，她还是表示不认同。但是可以看出来，她的思想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死板，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她很可能愿意说出历史真相，为自己讨回公道。

6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妻子（因为我妻子和她是一个村子的人，从小就认识侯冬娥，小的时候一同在她的娘家村居住，后来又同在高庄居住，两家的关系十分要好。）一起到她家里，三个人拉了一通家常，倒是她自己先向我爱人提出了问题：你丈夫说的能为我申冤报仇是不是真的？当我爱人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的时候，她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停了好久，她才说：我再考虑一下，咱们可以明天再谈这一个问题吗？我完全可以理解她当时的心情，毕竟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开端，我答应她明天再来就起身离开了她家。临走时，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明天一定要来啊！

第二天,我一个人到了她家。她就告诉我说,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翻来覆去脑子里尽是过去的事情。我给她一些安慰后告诉她:可以把一切埋藏在心底的怨恨慢慢告诉我,不要着急。我会尽快为你写好申诉书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

我刚刚说完,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对我说,我从哪里说起呀,我这可真是很难说的呀!还没有说完一句话,她就泣不成声了。我劝告她不要哭,她说她不哭,她要说。但是还是忍耐不住,越忍越难忍,最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忍不住,跟着她流起泪来。大半天过去了,她没有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拿着钢笔,一动也没有动。笔记本上没有写下一个字。我只好对她说,先安定一下情感,明天再谈。

又过了一天,我再到侯冬娥家。她告诉我,要我放心,昨天哭好了,晚上也睡了一个好觉,今天的感觉很好。这才从头开始一件接着一件地讲起来。我一边听着,一边记录。经过一整天的交谈,后来又经过多次时间上和情节上的回忆,进行了多次核对,整理出她比较详细的受害过程。以下是根据侯冬娥的叙述整理的资料:

1921年3月,我出生在山西省孟县西烟镇双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嫁到高庄村一个姓李的庄户人家做媳妇。1939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兵就到我们的村子里来捣乱。背着带有刺刀的长枪,头上戴着铁帽子,两只耳朵还盖着两个黄片片,一身的黄皮,穿着咚咚的牛皮靴子。

烧杀抢掠,还在村子里到处抓花姑娘。女人们东躲西藏,就怕见到日本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的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做军鞋支援前线;藏粮食,不让日本兵找到。同时也提醒姐妹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落到日本兵的手里。日本兵扫荡的时候,女人们夜里睡山洞,白天也不敢回家,脸上还要抹上锅底灰。就是这样,还是没有躲过日本兵魔爪。我有个绰号叫“盖山西”,也不知哪个开玩笑帮我起的,意为我的美丽在山西是挂得上号的,可是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真的以为是盖了山西呢。这一下没有躲避的地方了,到了哪里都觉得不安全。还是党组织的力量大,给我指导藏身的地点,好几次都是组织上的同志掩护了我。可是后来还是有人出卖了我。1942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日本侵略军进驻圭部队在伊藤(当地人叫他红脸)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进圭村距离高庄村只有20多里的路程,很近。)首先来到伪村长的家里,向他交待任务,要他立即把“盖山西”叫来。这个伪村长一听说要抓走我,心里也不情愿,嘴里一边答应一边找了一个理由,出了大门避开日本人,

找了一个村子里的人，让他赶快告诉我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家里，给日本兵做他们非常爱吃的黄米糕，（后来据很多人说，当时日本兵每一次到高庄村，都要吃伪村长做的黄米煮油糕。）以拖延时间。

伪村长一边做糕一边告诉伊藤说，侯冬娥出门不在家里。但这个红脸队长根本不理解伪村长的话，他命令他的部下把伪村长年仅15岁的小女儿抓过来，伸手就扒去了小女儿的上衣，吓得小姑娘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干着嗓子叫着她的爸爸，这个伪村长一下子明白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要在他的面前干什么。他不知所措，一下子横在红脸队长和女儿中间，伸手抱住红脸队长的腰，最后跪在他的脚前央求，让他们饶过他的女儿，他答应帮助日本兵去抓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他只好把我的住处和隐藏的地点都告诉了红脸队长，日本兵得意地笑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这个伪村长的小女儿还是没有躲过红脸队长的魔爪，被他强奸了。伪村长又恨又气，险些上吊自杀。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大门外不平常的响声，知道自己家被日本兵包围了，我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悄悄地溜出屋，沿着墙根慢慢地往外移，用手抓住墙头，翻身跳进邻居家。落地后，掀开窖盖，躲进一个土豆窖里藏了起来。日本兵冲进我的家里，看到我两个月的女儿还在炕头上哭，知道我没有走远，便四处查看。他们在院子里找不到我，沿着墙，就向邻居家来，到这邻居的院落里找，还是没有。他们闯进邻居李老太太的屋里，问老太太见到我没有。又把老太太推到院子里，问我藏在什么地方。其实老人也没有看到我藏进她们家的土豆窖，她说不知道，立刻被日本兵打得躺倒在地上，他们还把老太太的衣服扒掉，故意羞辱老太太。

正在几个日本兵折磨李老太太的时候，另一个日本兵看到了土豆窖被动过的痕迹，边上还有我的小脚新鞋底印子，他们掀开盖子，叽哩哇啦地叫喊着让我爬上来。我硬是不说话，也不往外走，一声不哼地躲在土豆窖里。日本兵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从土豆窖里弄出来，他们又不敢自己下到土豆窖里去，怕我有防身的武器，和他们拼命。他们不想把我打死或者打伤，要的是活生生的一个女人。我在下面也非常害怕，同时也知道，如果上去就落到了日本兵的手里，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决不能上去，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日本兵突然搬起两块大石头向土豆窖里“卜咚卜咚”地扔了下来，紧接着有两个日本兵就跳下土豆窖，站在我的面前。他们不由分说，一下来就把我的手抓住，往高处一举，上面的日本兵就抓住了我的头发，一下子就把我扔在院子里。此时此刻，我一点想



当年侯冬娥从这个门进入日军进圭据点(青木茂摄于2009年秋)

法也没有了,只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浑身发抖,站也站不住,牙“哒、哒、哒”地上下直打架,在日本兵的拉扯下好不容易才站立起来。日本兵的刺刀就在脊背上,逼迫着我走出邻居家的院子。我5岁的儿子从家里哭喊着跑过来,但是看到日本兵那明晃晃的刺刀顶在我背上的时候,他被吓得站在那里不动了,嘴里一直喊着“妈妈、妈妈”。我的心里一阵说不清的难过,忽然想到,这一次真的要离开儿子,离开我的家了。一时间甚至想到今天被日本兵抓走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到亲人,就不顾一切地挣脱日本兵的手,向儿子站立的方向奔去。儿子看到我向他跑去,他也又一次地迈开小腿,向我跑来。但是没有人性的日本兵横端着刺刀逼近我刚满5岁的儿子,一时间,刚刚往前跑的儿子又一动也不敢动了,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直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副非常害怕和可怜的样子。我看到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也不敢再往前跑了,赶紧喊着我的儿子,让他赶快回家,在家里等妈妈回来。儿子听了妈妈的话,还是看着那一把对着他眼睛的明晃晃的刺刀,一步一步向家里后退。我当时心里好像有几把刀子在刺着。

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走回去了,又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给那还在炕头睡觉刚满两个月的小女儿喂一口奶,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用枪托打着,从家门前的大坡上一步一步地拖下来。我不想走,就故意放慢脚步,日本兵在后面又是推又是拉,鞋早就掉了,我也没有发觉,裹脚布也散了,疼得动也不能动一下,日本兵只好架着抬到河槽里。脚没有了裹脚布就不能走动,坐在河槽里的石头上哭。几个伪军到大坡上捡来裹脚布和鞋子,为了拖延时间,我慢悠悠地裹着我的脚。红脸队长等得不耐烦了,抽出军刀叫了一声,还没有等我完全穿好,就把我推上早先准备好的毛驴,并且用绳子绑在毛驴的背上,向进圭据点走去。

到了进圭村,日本兵把我放在维持会的院子里,大部分吃饭去了,只剩下两个看守我。这两个日本兵把我推到一间房子里,松开捆绑我的绳子,手忙脚乱地剥了我的衣服裤子,我吓得话也不会说,叫也不敢叫,任凭两人轮番强奸。这是我刚刚被抓到进圭据点的头一天,晚饭前两个日本兵就这样把我欺负了,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